■文学艺术历史研究

论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及其审美倾向

王 兵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在家族灾难中建立,在一系列苦难人生经历中完成了由家到国的转变,它对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理与审美倾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构成了鲁迅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的独特性质,是评价鲁迅文学艺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关照下的文学创作符合民族文化的现实需求和长远目标,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中华民族;审美倾向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8)09-0090-05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8.09.020

Study on Lu Xun's Consciousness of the Roles of Eldest Child and His Aesthetic Tendency in His Works

WANG Bing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Lu Xun ha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oles of firstborn-child and firstborn-grandchild in his works,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amilial disaster. He completed the consciousness transition from a family issue to a nation-wide issue in a series of suffering life experiences. It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Lu Xun's life choice and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aesthetic tendencies, which constituted the thoughts of Lu Xun's literature and the unique nature of creative style.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evaluating Lu Xun's literature and art.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terms of Lu Xun's firstborn consciousness agrees with the realistic needs and long-term goal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represent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a precious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a.

Key words: Lu Xu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oles of eldest child, Chinese nation, aesthetic tendency

鲁迅的文学创作着眼于民族兴亡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目标决定了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审美范畴,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赢得了"民族魂"的称号。鲁迅文学这一特质与其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密切相关,可以说,在特定人生经历中锻造、发展并转化、升华了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是鲁迅成为"民族魂"式文学家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角色意识的统摄下,鲁迅的创作具有了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审美风尚,发挥了重大社会影响。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是作为长子长孙身份的家族后代,在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中孕育的继承家业、光宗耀祖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族血脉的传承,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作为家族后代的生命个体,都承载着承上启下的使命,都会将家业传承当做应尽的义务。但这方面,长子长孙尤为特殊,他们被强化了更为自觉的理性意识与人格特征。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以长子长孙为合法继承人的习俗,家中的长子长孙一

收稿日期:2018-01-12

作者简介:王兵,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鲁迅研究。

出生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成长中给予加倍的培养期待,于是,长子长孙通常具有强烈的家族使命感,他们以家族利益为己任,个性坚强,顾全大局,富有牺牲精神,在危难中能挺身而出,带领众人坚定信念、走出困境,成为家族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许多长子长孙不一定能够真正具备这一身份的角色意识,尤其是在专制文化肆虐的封建社会末期,由于长子长孙遭受专制文化的摧残首当其冲,他们受教愈多受害愈深,更易遭到个性的压抑扭曲,从而丧失这一角色意识不可或缺的自主性,以致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应尽的义务。因此,长子长孙角色意识与其天然身份并不等同,天然的长子长孙身份不一定必然拥有这一特定的角色意识。但同样生活在专制文化环境中,鲁迅却有着坚固稳定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这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

一、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世家望族的长子长孙,鲁迅一出生就深孚众望。由于他的生日和胎包都符合当地"有出息"的说法,儿时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明,被称为"胡羊尾巴"(机灵之意),于是人们认定他"将来一定要中状元。"[1]31 此时周家已走向衰落,鲁迅的降生为家族振兴带来了希望,在这一环境氛围里成长的鲁迅,从小就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使命感和自强意识。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这只是众多长子长孙的常态经历。这种众星捧月的成长环境,未必能够培养出预期的人才,反而有可能诱发始料未及的人格缺陷,如极端自我的任性自私、或盲目顺从的懦弱无能等。作家巴金发现了这一现象,以觉新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激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现实生活中鲁迅的父亲就是这类形象的生动例证。鲁迅父亲与觉新一样,都是长子长孙,却有着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性格特征。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但是,当家族灾难袭来时,他只会沉浸在个人的郁闷情绪中借酒浇愁,常常以砸碎碗碟来发泄心中的痛苦,结果忧愤成疾,吐血而死。这个原本应当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护卫弱妻幼子、支撑家门的长子长孙,不仅没有成为家人的依靠,反而率先精神崩溃以致病倒,他的身心疾患和宣泄压力的方式给家人带来更多恐慌,致使家族危机雪上加霜。鲁迅父亲脆弱任性的表现与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差异,既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同,也暴露了封建文化教育的失败。觉新是另一种异化的典型,专制教育和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使他养成了一味顺从的品行,他个性压抑,缺乏主见,面对复杂的家庭纠纷和时代浪潮的冲击无所适从,进退失据,成为一个性格懦弱,精神分裂,行为畏缩的"多余人"。鲁迅的父亲和觉新作为长子长孙,都受到了这一身份的特殊教养,但都未能具备这一身份应有的角色意识,更无法发挥出这一角色应尽的社会义务。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是封建社会大厦倾覆、后继无人的原因之一。究其实质,则在于专制文化与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培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专制文化扼杀人的个性独立与自主意识,而长子长孙角色意识需要个性的独立与强大。在专制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长子长孙,由于加倍承受了专制教育的压制,比普通人更易沦为专制文化的牺牲品而扭曲异化,从而成为懦弱无能、庸碌无为的人格典型。张爱玲在小说《金锁记》中描写了一个身份卑贱的女性曹七巧,她饱受等级观念的压迫,却以母亲的身份地位百般蹂躏比她更加弱小低下的一双儿女,作品以此把专制文化环境中代代因袭、冤冤相报、彼此辖制的人际关系揭露得触目惊心。小说里的贵族公子长白,这个寄托了曹七巧一生唯一希望的儿子,却在母亲亲手编织的"母爱"牢笼里沦为白痴,消磨掉了所有的个性与生命活力。张爱玲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专制文化环境中人性扭曲堕落的悲剧。

鲁迅也出身于类似觉新和曹七巧嫁入的世家豪门,有着同样森严的伦理秩序和专制文化环境,但他的境遇因一场灾难而发生了改变。在鲁迅 12 岁时,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父亲因之病倒、死亡。家族危机激发了他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而两代家长职位的接连空缺,迫使他提前履行长子长孙的角色义务,担当起家庭重任并成为母亲的膀臂和依靠。对于一个稚嫩的少年,这实属不幸,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的使命感和自强意识得以激发并获得了实践,其心智和能力得到了强化发展。祖父入狱和父亲病逝,虽然使鲁迅失去了依靠,但也使他摆脱了封建社会父权的重压,避免了普通人长期屈从于父权而导致的个性软弱与精神盲从。在"当铺"与"药房"的不断周旋中,鲁迅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困境与讥诮,其自主意识得以建立,个性也逐渐变得强大。父权的缺失,为鲁迅提供了正常环境下难以获得的自主权,使他能够以独立的意志回应现实的挑战,从而赢得了个性精神的自由发展。相反,在正常环境中,一个青少年很难逾越长辈的意志独立思考、自主行

事。觉新就是在求学、择偶乃至结婚、生子等诸多个人事件上也不得不服从家长的权威，结果在长期压抑中形成了屈从于环境习俗的生命惯性，以致于获得主权地位后也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是专制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长子长孙共同的人生悲剧。从现有资料上看，鲁迅的祖父脾气暴躁，性格固执，父亲也有传统的严父作风。鲁迅在散文《五猖会》中描写了父亲在他兴致勃勃去看五猖会时，突然强令他背书以致全家气氛紧张的经历，表达了因之大扫其兴的无奈之情。由此可以推想，假如周家没有经历灾变，鲁迅在祖父和父亲两代家长的权威之下，很难避免觉新这类青年所遭遇的难以抗拒的个性发展的阻碍。

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形成既源于正常的身份教养，也源于非正常的家庭变故带来的苦难经历。1898年，未满18岁的鲁迅就显示出非同常人的远见卓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社会的嘲笑，主动放弃了科举之路而进入了被奚落为“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学堂[2]415，计划学成之后去开船，当水手。这种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人生选择，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而这充分显示了鲁迅超凡脱俗的勇气与智慧。倘若不是在家族崩溃、父权缺失的危机中，很难想象这一异端行为的实施，也很难想象鲁迅在如此幼小的年纪会有如此坚定的创见。对比觉新可以看出明显的反差。觉新的时代已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比鲁迅赴洋学堂要晚得多，但传统礼法仍然禁锢着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难以挣脱环境和习俗的羁绊。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是以祖父与父亲两代人的生命为代价赢得了个性自由的成长空间，事实上，即使在这样相对自主的环境中，他仍因传统孝道的牵绊而不得不在婚姻上屈从于母亲的意志，结果酿成了一生的家庭悲剧。鲁迅曾在众人对许寿裳丧妻而留下“失母幼子”深表同情时说：“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人。”[3]129这种独特见解深得于鲁迅自身情感体验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在家族灾难中确立，在一系列苦难经历中逐步成熟，这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顽强抗争等精神内涵，在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转变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来，这种民族意识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上古文明的卓越地位，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但随着传统文化的日渐衰落和闭关锁国带来的思维禁锢，这种一成不变的民族认知与近代中国的现实处境形成了极大反差，于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传统的民族意识便暴露出固步自封与妄自尊大的弊病，加之专制制度的影响，民族观念往往被皇权意识所裹挟，对民族的情感几乎等同于忠君意识，因此，在封建社会末期，国人的民族意识要么沉浸在虚妄的优越感和狭隘的忠君思想范畴，要么就是只知家而不知国，把民族国家当作帝王之事而认为与己无关。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由于国门打开和外来文化的进入，国人开始具备了世界人类的整体概念，对自身的民族特性与现实处境也有了客观清醒的认识，于是，民族意识便由妄自尊大、愚昧麻木转变为对民族危机的忧患和对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反省，这是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历史背景下萌发的具有新的时代特性的民族意识，是民族命运得以扭转的内在精神资源。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鲁迅的民族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离开家乡之前，他的民族意识相对薄弱，更多占据头脑的是家族意识。作为周家的长子长孙，挽救家族命运是他的人生使命，这使他具有了奋发图强、勇于担当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也使他养成了从家族的处境需要出发来确定个人发展方向的思维方式，于是选择赴洋学堂学习职业技能。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立足于家庭困窘的经济状况，免收学杂费的洋学堂便成为首选，但更重要的是遵循了祖父的家训。鲁迅祖父有感于子孙饱读诗书却毫无实际的生存本领，以致在家族灾难中难以为继，于是告诫子孙要转变观念，以“开豆腐店，做点实事”的态度立足于社会[1]97。祖父这一“重技务实”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观念大相径庭，这是周家在不幸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独特智慧。显然，鲁迅的“异路”抉择，正是以此家训为指导，是对家族精神遗产的继承。然而，当鲁迅在“洋学堂”里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后，他的视野得到了极大扩展，对国家的概念处境有了实际的了解，于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这期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震动很大，其“优胜劣汰”思想令他十分担心中华民族会亡国灭种。此时，家族患难与民族危机在鲁迅心中紧紧纠结为一体，使他开启了家国并重、并逐渐由家向国转变的思想历程。

赴日留学是鲁迅由家到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

期。初期的医学选择清晰地表现了这一阶段家国并重的思想状态。留日期间,鲁迅的弱国子民身份强化了从进化论中萌发的民族意识,也使他的民族认知在理念与情感体验上得到了相互印证,于是,在新的职业选择中,他有了民族意识的观照。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自述学医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416。与第一次职业选择相比,这一次的选择同样是从家族的生活经验出发,以父亲为庸医所误的情感体验和祖父"重技务实"的家训为出发点,但大大突破了此前单一的家族与技术范畴,由父亲推及国人,由家族扩展到民族,增添了应对民族危机和启蒙国民文化的新内容,这种家国并重、从家族向民族拓展的思维倾向是鲁迅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弃医从文是鲁迅职业方向的又一重大转变,借此,他彻底完成了从家族到民族的思想飞跃。由于"幻灯事件"的启发,鲁迅意识到民族的希望在于国民灵魂的更新,而文学艺术是抵达人的灵魂最有效的途径,于是"弃医从文"成为他最终确定的人生目标。这一次的选择,完全着眼于民族的需要,为此不惜背叛祖父凝聚了家族血泪的遗训,重拾祖父所摒弃的、因缺乏实用价值而难以为生计提供保障的文学艺术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显然,此时的鲁迅,已彻底完成了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置换,其家族意识完全被民族意识所取代,他已从周家的长子长孙转变为中华民族的长子长孙,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的重任,在民族危难的时代背景下,把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的改造当作个人的使命,其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转变使鲁迅升华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的获得并非出于人生历程的自然演变,而是经历了主体精神的裂变与新生。表面上看,鲁迅从家乡到南京、日本,随着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其身份角色和思想意识也不断拓展,这似乎是命运给予良好机遇的结果。但事实上,鲁迅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不是对环境被动的顺应,而是对现实的逆向反叛,为此,他付出了极为痛苦的精神情感代价。从第一次赴洋学堂开始,鲁迅就背负着"把灵魂卖给鬼子"的责难,此后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是在众叛亲离中的独行"异路",在不断遭遇的"穷途"与"岐路"中[4]15,从"本没有路"[2]485的地方踏出新的人生之路,表现了过人的勇气、执着与坚韧。相比之下,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因缺乏与环境习俗决裂的勇气,也因不敢面对自我灵魂中新旧生命的裂变而未能走出旧有的人生轨道。巴金在觉新身上揭露了这类人心灵深处的怯懦,他们明知陷入了"吃人"的网罗,却惧怕挣脱这网罗所应付的代价,他们在向现实环境与世俗传统的妥协中,暴露了自己对灵魂生命中旧我的依赖,结果,他们以被动的忍受麻痹自己,以健忘的方式逃避现实,最终只能徘徊于原地而未能挣脱封建家族孝子贤孙的身份禁锢。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建立与升华得益于他敢于与世俗传统决裂的勇气,这种不惜代价、甘冒风险的坚定信念使他获得了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

三、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审美倾向

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虽然经历了由家到国的转变,但其中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坚韧执着的进取抗争精神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它使鲁迅养成了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大局,勇于担当、富于牺牲的思维方式,这不仅影响了鲁迅历次人生道路的选择,也规定了他的情感、心理与审美倾向,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独特属性,是评价鲁迅思想艺术价值不容忽略的因素。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影响了鲁迅的主观情感偏向,使他对客观的生活经历做出了符合其角色意识的情感过滤,于是记忆中的情感体验便具有了这一角色意识的独特性质。例如,同样是乡间的避难生活,其弟周作人的回忆充满了乐趣,而鲁迅则留下了"乞食者"的悲哀;同样是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写下了"远游恋异乡,久客不思归"的诗句[5]47,抒发了对日本生活的眷恋,而鲁迅则在文中记叙了"漏题风波"与"幻灯事件"的刺激[6]304,表达了弱国子民的屈辱。按照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兄弟二人的记忆差别并非完全出自于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是"自我"对生活素材做出了不同内容的取舍。人的生活经历客观上是复杂多面的,但只有被"自我"认可的体验才能进入意识领域,从而在主观情感上留下强烈印记,那些未被"自我"认可的经历则会被意识忽略、淘汰,于是在主观情感上形成了独具"自我"意识特征的生活记忆。周氏兄弟作为不同的生命个体,在人生经验上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二人的许多经历却是彼此重合、相互印证的。周作人也经历了家庭灾难和弱国子民的不幸,鲁迅也有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日本文化、日本人的赞赏,但是,在情感体验的总体倾向上,二人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自我"体认。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规定了他的"自我"选择以现实

的忧患与使命担当为关注焦点，于是，敏感于外界的歧视压迫和由此激发的反叛抗争便成为他心灵感受的主要内容。周作人没有这一角色意识的影响，因此，他能够较多从个人趣味和常态人生的角度感受生活，于是更多摄取了生活中轻松愉悦的一面，这种不同风格的体验很大程度上源于角色意识不同而导致的结果。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倾向。鲁迅反对超功利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肩负起改造社会、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使命。为此，他反对消闲娱乐的文学观，批判林语堂、周作人提倡的闲适与幽默。在文学的审美风格上，他崇尚充满战斗精神的“力”之美，摒弃以平和、静穆为审美追求的所谓高雅艺术，这些都是围绕民族的处境需要而做出的选择。鲁迅认为：小品文是“太平盛世”里的“小摆设”，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7]577这段文字说明了鲁迅不赞成娱乐性文学艺术的原因首先因为它属于“太平盛世”，对于尚处落后危机中的中华民族，它的兴盛是不合时宜的。其次，鲁迅认为，娱乐性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不应作为艺术审美的终极目标，而应当是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劳作与战斗的调节，是促成理想目标实现的助力之一。也就是说，鲁迅并非完全反对娱乐性文学艺术的存在，而是提醒人们要适时、适当地运用这一艺术，不能为娱乐而娱乐，从而丧失了更为崇高的人生追求。鲁迅的见解，不仅对于身处危难的中国人是当头棒喝，即使是在太平安逸的时代，也未尝不是大有裨益的良言警语。这种紧紧立足于民族的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不忘使命、执着于理想的宏大视野，是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特有的思维方式。

鲁迅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态度一直引发文坛的争论，尤其是时代进入到一个和平的反崇高、尚个性、呈多元发展态势的文化氛围中时，鲁迅的文学思想似乎显得过于保守了。从文学艺术的本质上看，其功能应当是丰富多样的，那么，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也理应多元并存。若以此为衡量标准，鲁迅的文学观似乎缺少包容性。但是，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主体特性和背景参照，否则就会无的放矢。鲁迅的文学观并非是在理论认知上的偏狭，而是在深谙文学功能和审美风格多样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民族文化做出了有现实针对性的引导，换句话说，鲁迅对待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地为艺术而艺术，他有着比艺术审美更高的民族振兴和人类理想的远大追求，正因为如此，他晚年从小说、诗歌转向了更能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杂文创作，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认为这是他艺术成就的一大损失。但鲁迅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他声称自己从来都无意于做文学家，实事上，鲁迅从事文学活动最初始的动机就是以文学为武器促进中国文化的变革，文学本身并非其目的，这里显示出不同志向和评判标准的极大反差。鲁迅的创作转向，仍然是以民族需要和使命担当为指向，是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观照下始终如一的选择。

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风格都是其独特人生经历和个性情感的产物，都是别具一格的，都不可能涵盖文学艺术的全部。从这一点上看，每一个作家的文学风格都是有所倾向、也是有所局限的。文学艺术整体的丰富多彩绝非一个作家集于一身的表现，而是众多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倾向从局部汇聚而成的整体，对任何一个作家求全责备都是不切实际、不合情理的。鲁迅的文学当然难免其独特倾向，但这一倾向符合中华民族整体的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因而它涵盖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性与发展方向，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鲁迅以中华民族长子长孙的角色意识“替大众受罪”，将民族的苦难和重任集于一身，“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2]140。这种舍我其谁的民族情怀与文化担当，使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段国超.鲁迅家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2]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许寿裳.鲁迅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4] 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止庵.周作人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6] 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李兆平]